

# 寻根之路的同行者——阿城与汪曾祺比较

曹聪聪

辽宁师范大学

**摘要：**汪曾祺与阿城相差三十岁，二人的人生轨迹随着八十年代寻根文学的出现而产生交集。一老一少在文学创作的精神与追求上有着不谋而合的交错。其一为对待变故所产生的韧性，其二在对待世俗生活的认真美学——尤其体现在“吃”上。这种多元化之下的共通性，在寻根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中产生交集，共同丰富了寻根潮流的文学内涵。

**关键词：**汪曾祺；阿城；寻根文学；世俗描写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2.02.243

引言：汪曾祺与阿城共同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形成了相似的文化结构与心理构成。这种相似性共同成为寻根文学发生发展的推力。通过比较发现二者在文学创作中共同倾注了小人物对俗世生活的热爱，对饮食的重视。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感情结构对寻根文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成为寻根思潮的文学创作理念基础。探究二者共同处有助于深入理解寻根文化的思想内核，也对寻根思潮的意义进一步丰富和深化。

## 一、在世俗变故中的韧性

### 1、相似的心理结构，面对挫折的以柔克刚

汪曾祺中年时期遭遇人生变故，被打为右派，在《随遇而安》等散文篇目中，都有多次提到被打为右派的心路历程。“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1959年夏被打成右派，1960年被平反，几年以后又经历“文革”，被下放到农村劳作。这些经历在汪曾祺笔下却变得风轻云淡，并不加以激烈批判，也甚少埋怨不公，更极少直接抒发不满，只是三两笔带过。

汪曾祺在饱受折磨的时期，落到笔下，也仅是“真够一呛”“但还是咬着牙挺过来了”寥寥几笔，大而化之。《随遇而安》写于1991年，距离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已经过去三十年之久。苦痛经过时间的沉淀，浓涩中生发出平和的韵味。这种应对苦难而产生的韧劲，是中华民族历经千年所形成的生活的智慧，是面对变故无力转圜而生发的对世俗社会与自我内心世界的调节与中和，在这股韧劲下，汪曾祺得以保留性格中悠然，淡然的一部分，此后继续在文坛活动。

阿城与新中国同年出生，在幼年时期父亲遭遇了变故，他与母亲、弟妹流离失所。在同龄人参与红卫兵，风风火火投入“革命”时，他在琉璃厂的文物、书作中，受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在历史文献中积淀的营养厚积薄发，在后期成为阿城创作中文化底蕴的重要来源。

阿城在《棋王》中借“我”的视角转述王一生的个

人背景，文中的“我”作为第二主人公，与知青阿城本身有着某种暗合关系，在这一视角的背后藏着阿城看待生活的一双眼。这双眼将纷扰俗世柔和美化，染上极具个人特色的淡然和悠扬。文中“我”与王一生一边抽烟，一边谈论王一生母亲的身份，字里行间更多带着一种豁达和平和，这种从容的气氛随着烟圈缓缓扩散，不着痕迹地融入大化之中。同样《遍地风流》中，对于小人物面临苦难、变故时展现出的豁达从容、苦中作乐的隐性描写，是深深浸润着阿城本人对待苦难的态度。阿城对待苦难，同样具有韧性，这种性格使他在八十年代盛行文坛黑暗压抑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中开辟出独有的具有传统美学色彩的世俗文学。

面对特殊年代遭遇的疾风骤雨，一生之中浸染传统文化之淡泊宁静，是汪曾祺与阿城对待变故的锦囊法宝。二者在人生之路上并非坦途，而是在泥泞中前行，一老一小，相继走入雨中，回首望去，相视莞尔，可谓“同行者皆狼狈，余独不觉”，同样坚韧，以柔克刚。

### 2、韧性背后的不同观照点

汪曾祺与阿城对待苦难与现实，冲淡平和，大而化之，但仔细品味仍有相异处。

首先是叙事背景营造的不同。在汪曾祺的散文中，关于直接描写“文革”，亦或是社会政治矛盾较为突出的动荡岁月的文字是相对比较少见的。经典篇目如《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受戒》等，都将故事发生背景定在江南水乡，不刻意限定时间、地点。将地域边缘，时间节点淡化，着力塑造一个温柔恬淡的，超脱于具体尘世之外的叙事背景。致力于将人物活动背景放置在社会矛盾相对平和的状态，极少强调外界政治、现实社会对于人物行为模式的影响。而在阿城的小说中，如“三王”系列，《遍地风流》等篇目中，表现得与汪曾祺截然不同。他更主张将人物放置在真实历史大背景下，最常见的叙事背景为“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期。主打突出小人物背负历史滚滚尘埃的压力之下，如何处理个人命运与国家历史走向之间的冲突。关注小人

物在波涛汹涌中的浮沉，书写俯仰之间所产生的平和和从容，抑或是卑琐自嘲，是阿城的写作内核。阿城笔下的“平淡”，受历史局限，每个人在大环境的裹挟之下无力支配自己命运，更多地是无奈之中，退而求其次所生发出来的“从容”。

其次是“韧性”背后的情感来源不同。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小人物对待生活的“韧性”来源于自身内心的善良与美，是主动对生活的迎合，在苦难之中仍保持对俗世生活的爱。如《受戒》小和尚明海因为家里贫穷少粮而出家做和尚。而阿城笔下小人物的“韧性”来源，多是与时代洪流抗衡无效的被动接受。在他的言语之中，我们看不见激昂愤慨，更多的是看到不善言谈的“随遇而安”。在无力改变现实命运之下，所不得已的自我催眠而产生的平和稳定，更加具有时代的烙印。可以说，汪曾祺与阿城的艺术书写都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以柔克刚的能量，但汪曾祺的生成源头是自身对于美的发觉，是对外界匮乏物质生活的“轻视”，更为重视自我内心的成长与平静；而阿城的平淡则是对现实无力改变，无奈之下的“退而求其次”。

## 二、对世俗饮食的重视

### 1、“吃”在二人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地位

对于“吃”的考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特色的地位。在这个“民以食为天”的国度中，饮食有着承载一切的根基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代风雅文人墨客将美食与文化紧密结合，这种联系随着历史根系一脉相承，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环。对饮食的精致描摹，在二人创作中都共同起到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饮食成了侧面烘托人物形象，营造特定氛围的工具。汪曾祺的创作中，关于“吃”的章节比比皆是。于散文中，最常见的地域范围是高邮故乡与西南联大。对于自己熟稔的地域，汪曾祺是很乐意花大量笔触刻画的。例如《受戒》中，对当地和谐自然氛围的营造，正是靠着描写和尚们“喝酒吃肉”的饮食习惯来侧面展现的，这种不违背人性的社会风尚，才孕育出小和尚明海纯净明朗的爱情。饮食也作为汪曾祺小说中串联故事，展现时空变幻的参照。《黄油烙饼》中，以饮食作为时间流动的参照，从最初能吃饱，到吃大锅饭，到最后越来越差来展现时间的推移。《鉴赏家》中，小贩叶三按照时节卖果子，立春卖萝卜，端午卖枇杷，夏天卖瓜。《安乐居》中，酒客们相继走进安乐茶馆，每个酒客按顺序点一杯酒，讲一串故事。这种对于时间的模糊性处理，用食物的时令或者特定顺序来联结故事脉络，也成了汪曾祺构建小说的手段之一。

“吃”在阿城的小说中，同样承担重要任务之一，

作为塑造人物形象的一部分，参与叙事，成为侧面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在阿城的《棋王》中，“吃”作为王一生的基本性格特征之一，成为塑造其人格，丰富性格内涵的叙述方式。在送别车站，王一生的吃相难看，“终于嚼完，和着一大股口水，咕地一声儿咽下去，喉结慢慢地移下来”。在这时，王一生仍然将为了精神愉悦的“吃”定义为“馋”。后来吃到了蛇肉、麦乳精等不为果腹的食物，王一生对饮食的态度也在进一步深化，他的人性在逐渐拓宽延展。从“吃”上，我们看到王一生从最初的冷漠克制，成长为有情有义，爱吃爱棋的更加完整的人。在这一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塑造过程中，对“吃”的描写是承担重要意义的。汪曾祺也发现了阿城《棋王》中对“吃”的经典描写，并在《人之所以为人》中如此评价：《棋王》两处写吃，都很精彩……一处写对吃的需求，一处写吃的快乐。可见汪曾祺是认同阿城对于“吃”的描写的，二人有着相近的文化构成，具有相似的心理结构。

### 2、“吃”背后隐藏的不同出发点

汪曾祺写饮食的背后，写的是乡愁，是对生活中美的发觉。汪曾祺更重视对饮食本身的书写，从来源到做法，如数家珍。在大学、工作期间，寻一些云南当地的特色菜来吃，被汪曾祺撰写成一篇篇小散文，点缀在生活散文化小说间。从菜品的原材料到做法等，形成了自己的“人间有味”。如《昆明的吃食》《故乡的元宵》《贴秋膘》等散文小篇中，将“吃”与故乡连接，使司空见惯的食物抹上一道淡淡的乡愁。在文中事无巨细地写食物的原料、调料、做法，不厌其烦。在汪曾祺的“吃”中，写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更是隐匿在食物背后的生活美学，苦中作乐的生活情趣。汪曾祺善于利用散文化的小说，笔记体的散文等自由体式，将自由散漫的文体形式中嵌入对食物的感悟，在文字中展示不同生存状态下的饮食习惯。无论是苦中作乐的简单吃食，还是精雕细琢的经典菜系，我们看到的都是汪曾祺自由乐观的精神情怀。

阿城写饮食的背后，是写小人物对生存的执着。饮食作为人延续生命存在的方式出现在创作中，在作品里少见精雕细琢的饮食制作，更多的是书写人物吃的过程，动作。对饮食的刻画也在小说、散文中俯拾皆是，对饮食的细致描写成为他书写普通人世俗生活的工具，也是小人物处理俗世与自身发展之间不平衡矛盾的自我安慰方式。《棋王》王一生的狼吞虎咽，就是在饥饿年代中满足自身存在的最基本诉求。小说创作中，阿城对于饮食刻画的观照点与汪曾祺是不同的。汪曾祺重视饮食本身蕴含的文化内蕴，阿城重视的则是做出饮食动作的世俗中活着的人。《棋王》描写王一生在车站“虔

诚”地吃，描写众人围坐吃蛇肉的场面，这些都是俗世生活之中的人的活动。阿城更重视描写有人的场面，进而书写历史洪流之下的普通个人命运。

### 三、对于寻根文学内涵的丰富

#### 1、回归本心，以人为本的书写目标

在《遍地风流》中，阿城也不惜笔墨来写俗世生活下“活着”的人。《峡谷》中十分精细地描写的骑手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纵火》吴顺德为了不受政治牵连处理自己收藏的青天白日国徽的月份牌，不惜放火烧家；《会餐》更是大段铺排，极尽场面渲染，从做豆腐、杀猪，到摆宴、聚餐，带有浓厚仪式感的盛大场面之中，是世俗生活中凡人对待仪式的严肃认真，是对待生活的一丝不苟。从中透出的，是对存在本身的重视与维系，是普通人用力的生活。汪曾祺更是在文字中尽情书写小人物、小事件。汪曾祺《黄油烙饼》《鸡鸭名家》《受戒》更是书写普通人的命运走向，将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混合着江南水乡的文化，通过“水”一般温柔平和的文字展现出来。

二者在八十年代文坛上充斥着伤痕、反思潮流时，回避政治，直面本心，书写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近乎怀旧的审美追求。汪曾祺在《自报家门》中提到：我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并且是个诗人。阿城《棋王》中王一生积极入世，参加车轮鏖战也是儒家的精神体现。儒家历来被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作品中对儒学的体现，同样是二者对民间世俗文化内核的肯定。儒家学说中以人为本的“仁爱”思想，推动寻根文学重视人的存在，回归普通人的本真之心，书写凡人生活。

#### 2、重拾艺术创作的美文追求

在创作中注重音韵，丰富寻根文学的美学内涵。汪曾祺在《我是怎样与戏曲结缘的》最后一部分写到：如说我的小说有一种音乐感，除了我会抹几笔国画，大概和我会唱几句京剧，昆曲，并且写过几个京剧剧本有关系。阿城在《如果你会读出声音的话》文中提到：语意当然是重要的，但是这次你们多想象声音，声音是有独立美感的。可见二者都重视在创作文字的过程中，注意音律的处理。阿城《天骂》：手麻麻的，脚热热的，膀痠痠的，炕硬硬的，把屁股压得扁扁的。汪曾祺《受戒》：姐儿生的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些跳跳的。二者都十分重视音律的和谐，这与两人的文化结构中戏曲的影响是离不开的。这种音律的美，体现在寻根时期的文学创作中也十分典型。《孩子王》写第一天上课的情形：桌椅乒乒乓乓响，教室里立起一大片人……桌椅乒乒乓乓又响，一大片人又纷纷坐下……学生们笑起来，乒乒乓乓坐下去。阅读过程中不仅是音律的节奏感，更在脑海中浮现声音，

将听觉形象化、具体化。

小说中重视场面感，赋予文字以绘画的美学品格。阿城《星星点点》《心道合一》《乐乐画画》等小文中，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绘画的艺术，可见其在绘画的造诣。汪曾祺在《两栖杂述》提到：我以为，一篇小说，总得有点画意。二者文字中淡然悠远的画意共同来自中国古代山水画的留白、白描等技法，对于绘画感的重视同样丰富了寻根文学创作过程的意蕴。阿城《树王》刻画放火烧山的场面一段，十分具有画面感：火中一棵大树腾空而起，飞到半空，带起万千火星，折一个筋斗，又落下来，溅起无数火把。汪曾祺《受戒》：惊起一只青桩，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寥寥数语，勾勒出一幅江南水乡图。

在汪曾祺和阿城二人的文学创作中，展现出传统文化涵养的美学品格，表现为二人文字中共同具有的音乐感、绘画感。这种对文字美的追求，丰富了寻根文学的艺术内涵，冲击了八十年代处于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却没有完全背道而驰，而是在冷峻写实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外，开辟了一条具有文人温柔笔触的真实反映俗世的道路。

#### 结语：

汪曾祺与阿城面对政治生活疾风骤雨时，都展现出中国传统文人的韧性，正是这种以柔克刚的精神品质，使二人的精神气质得以保留。二人相差三十岁，但随着寻根文学的出现产生交集，这是相近的心理结构和文化构成所致，可谓殊途同归。在文学创作上，二人虽然联系不多，但共同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俗世生活中饮食的重视，拉进了二人之间的距离。他们既有同质处，又各自生长，共同充实丰富了寻根文学的组成。在这之后，他们并不止步于此，而是更积极探索新的适合自己的文学风格。

#### 参考文献

- [1]阿城.阿城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7.
- [2]王德威.当代小说20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309.
- [3]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 [4]阿城.遍地风流[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 [5]韩旭阳.浅谈饮食元素在汪曾祺小说中的功能与意义[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 [6]李建军.中性风格的魅力与局限——平心试论汪曾祺[J].文学评论,2016(4).